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
消费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刘璐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马雪峰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3年06月14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刘璐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签名： 马彦 签字日期： 2023.6.12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选择“同意” / “不同意”) 以下事项：

-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刘璐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签名： 马彦 签字日期： 2023.6.1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Candidate :Liu Lu

Supervisor:Ma xuefeng

摘要

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有着巨大的潜力，是未来扩大内需、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金融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消费的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降低了居民的参与门槛，使得农村居民享受到更加便捷地金融服务，努力缓解了农村地区存在的金融排斥现象，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的不断提升，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蓬勃发展。甘肃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在推动甘肃省整体消费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梳理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层面上，主要通过回顾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概念、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现状以及梳理普惠金融与消费的理论，提出本文的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设。实证层面上，主要基于2011年-2020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第一，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中，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通过门槛模型分析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在跨过门槛值之前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大，即：第一产业占比越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本文结合甘肃省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部门联动加强监管、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以及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技能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习惯

Abstract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s great potential and is the main focus for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stabilizing growth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an promote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Relying on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improved the inclusiveness of finance, lowered the threshold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made rural residents enjoy more convenient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de efforts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exclusion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he Internet and smartphone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helping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As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Gansu Province has a relatively larg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growth of Gansu Provinc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mainly through reviewing the concep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and sorting out the theory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esearch assump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proposed. On the empirical level,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4 cities (prefectures)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0, a fixed effect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whether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how that: Firs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Gansu Province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econdly,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the depth of use and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 Thirdly, through threshold model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and before crossing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is greater, that is, the small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this thesis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through various departments, develop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skills of rural residents o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
Consumption habits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3
1.2.1 研究内容.....	3
1.2.2 研究方法.....	5
1.3 相关概念梳理.....	5
1.3.1 数字普惠金融.....	5
1.3.2 农村居民消费.....	5
1.4 创新点和不足.....	6
1.4.1 创新点.....	6
1.4.2 不足之处.....	6
2 文献综述	7
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7
2.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7
2.1.2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	8
2.1.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	9
2.2 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10
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11
2.4 文献述评.....	13
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14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14
3.1.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14
3.1.2 甘肃省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和使用情况.....	18
3.2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0

3.2.1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20
3.2.2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21
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及机制	23
4.1 相关理论基础	23
4.1.1 普惠金融相关理论	23
4.1.2 居民消费相关理论	25
4.2 影响机制	27
4.2.1 数字化支付途径	27
4.2.2 消费信贷途径	28
4.2.3 保险途径	28
4.2.4 理财途径	29
4.2.5 影响机制分析	29
4.3 研究假设	30
5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	31
5.1 变量及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5.1.1 变量选择	31
5.1.2 数据来源	32
5.2 模型设计	32
5.2.1 普通面板模型	32
5.2.2 门槛效应模型	33
5.3 样本描述性统计	33
5.4 基准回归分析	34
5.5 稳健性检验与影响机制分析	35
5.5.1 内生性检验	35
5.5.2 稳健性检验	37
5.5.3 影响机制分析	38
5.6 异质性分析	40
5.7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42
5.7.1 门槛效应检验	42

5.7.2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43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5
6.1 研究结论	45
6.2 政策建议	46
6.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46
6.2.2 各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47
6.2.3 发展当地特色产业	48
6.2.4 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技能	48
参考文献	50
后 记	56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这也使得农村居民在消费市场上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并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指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其中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努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的关键举措,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甘肃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居民消费稳步上升。2011年-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约为1.7倍。同时,对比甘肃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析。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这十年增长约1.2倍。从整体上分析,虽然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一直存在,但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始终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因而,甘肃省农村地区未来仍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释放。

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2006年我国由焦瑾璞在小额信贷论坛上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开始使用。普惠金融亦可称之为包容性金融,目的是在平等基础上提供可持续且有效的金融服务。随着普惠金融的实践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两者产生了较强的关联性,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降低了投资门槛和成本,给居民提供了消费便利,并且其多元化的金融产品给居民更多的选择空间。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几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开发多元化金融产品、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业务、发展农业信贷以及农户小额信贷等业务,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纲要也指出要努力培育发展数字消费。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的支付模式、多元化的保险和理财等

途径,改变了农村居民原有的消费方式和习惯,能够有效地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提升了消费信贷的使用率,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金融服务所带来的便利,增强了农村居民的金融获得感。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该地区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特性,具有相较于发达地区更好促进消费的功能。甘肃省地处西北,与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各个市(州)发展的水平不同。在金融科技的普及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能。那么,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是否具有影响?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因甘肃省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即:第一产业占比多少,是否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答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2011-2020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且深入讨论。

1.1.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上:消费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消费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关注。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之前的消费习惯,解决了地域等限制问题,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更多的学者将研究角度锁定为全国层面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从某一省份和地区为研究角度的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择从甘肃省的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将基于理论和文献研究所得出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增加了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实践层面上: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普惠金融所具有的特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达范围,有利于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助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种类的多元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选择空间,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的消费提供了便利性,可以节省消费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甘肃省农村地区发展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本文选择从甘肃省出发，分析研究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让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对促进甘肃省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整体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本文的相关概念，列举本文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方面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角度进行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单独省份的相关研究较少，可以进行补充。

第三章为现状分析部分。整体上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列举数据和图表，使结果更加清晰明了，为后文理论与影响机制分析提供支持。

第四章为理论与机制分析部分。在梳理和借鉴已有相关文献和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并进一步提出本文假设。

第五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在已有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进行回归分析，然后进一步讨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所具有的门槛效应。

第六章为结论建议部分。根据上一章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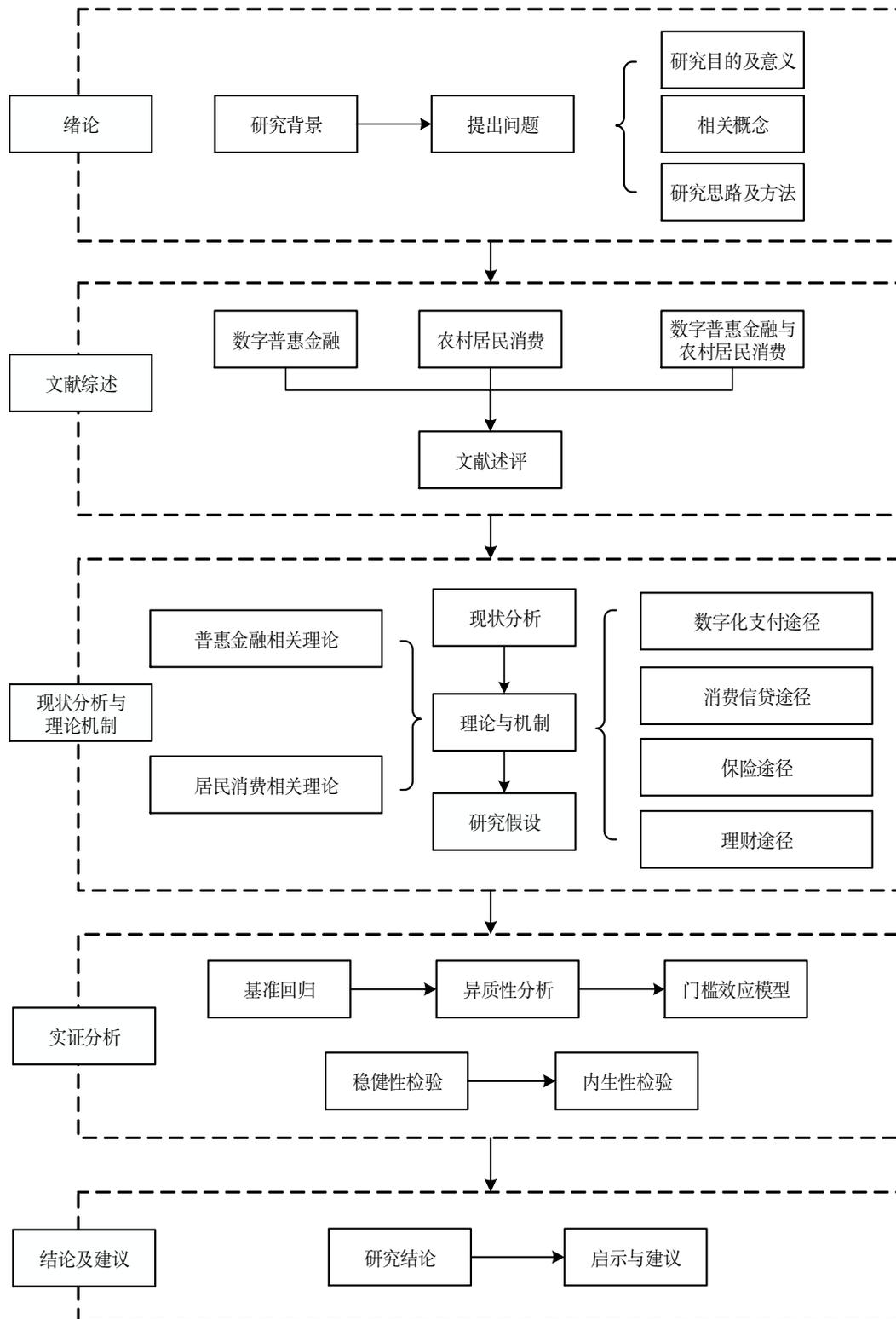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2.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对已有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借鉴，明确本文研究方向和中心，分析其影响机制，为后文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与支持。

(2) 实证分析法：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地市（州）构成的面板数据，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实证分析。

(3) 比较分析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结构进行异质性检验，并针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使论证更可靠。

1.3 相关概念梳理

1.3.1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的正式概念出自于 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将其广泛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从本质上来看是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概念的加成，其内涵核心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普惠金融水平，而数字化的最大作用在于能促使普惠金融商业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内容涵盖了普惠大众所需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

1.3.2 农村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的定义^①为：乡镇或农村常住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农村消费支出可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行、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① 农村居民消费的定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4 创新点和不足

1.4.1 创新点

(1) 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转变以往从全国层面的研究角度，选择从甘肃省地级市（州）的分析角度出发，让分析更具有地域特点，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甘肃省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同时，在乡村振兴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有着深层次的意义。

(2) 在研究内容方面。第一，本文选择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异质性入手进行分析，改变了以往对整个区域等划分进行异质性研究的方式，从而更加直观的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结论。第二，本文对基于理论和现状提出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让整个文章脉络更加清晰。第三，由于各个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同。本文利用甘肃省各个地级市（州）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比）不同，来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1.4.2 不足之处

在研究过程中，尽力做到有逻辑、有条理，但是研究水平有限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少，可以借鉴的参考的文献和模型较少，研究上可能存在不够深入的现象。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2.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Peterson K (2017)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效果显著,并且无论是对于用户还是对于提供商都是有利的。Bogan (2008)通过研究得出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居民可以有效的参与到金融活动之中。Sharmila (2019)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信贷的发展助力,并且信贷资源的获得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二者的有机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方式。Peter et al(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方式发生变革,有利于推动金融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以及政策的梳理得出,我国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大体上分为四个时期。

(1) 第一阶段为2005年-2007年。我国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明确了对小额信贷的相关政策。同时,这也使得国内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分析研究。杜晓山(2006)从小额信贷视角出发,通过客户、微观、中观、宏观这四个层面来论述普惠性金融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集中于农村的普惠金融方面,而这一阶段属于发展线下普惠金融阶段。

(2) 第二阶段为2008年-2012年。这一阶段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进行重点研究。第一,金融稳定与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改革必然要进行金融法律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科学的框架。邵将(2021)提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些会对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管理规范 and 标准。所以,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有效且规范的法律保障体制,助力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与金融普惠性。张勋(2019)认为在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条件下,通过开创新的融资模式来缓解中小企业出现的资金困境。而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由于这一阶段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后金融危机时期。

(3) 第三阶段为2013年-2015年。2013年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国内学者对

这一领域的研究关注度与日俱增。吴晓求（2015）认为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普惠金融与其相结合，增加了对传统金融的冲击，促进了大企业金融等向普惠金融转型。何婧等（2017）提出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金融排斥等问题，应逐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力度。这一阶段已经处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初期。

（4）第四阶段 2016-2021 年。2016 年 20 国集团颁布了《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同年，我国也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这也是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这一阶段属于数字普惠金融新时期。

2.1.2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Kapoor(2014)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Klapper Leora 和 Singer Dorothe(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借助其特性让更多的家庭可以获得资本的集聚。也因此，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蒋长流、江成涛（2019）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提升网络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于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较大城市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钱海章、陶云清（2020）等学者认为数字金融这种新兴的金融模式有利于激发各地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各地的创新创业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短城乡收入差距。Salazar-Cantú(2015)通过对墨西哥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随着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能够缩小收入之间的不平等。耿良等（2019）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无论是对农业收入方面还是非农业收入方面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相邻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贾洪宇等（2021）运用各地人均 GDP 水平不同的这一特点，将人均 GDP 作为门槛变量，得出在跨过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胡振华等（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还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着带动作用。不仅缩小本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还缩小了临近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殷贺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结构具有异质性，其中数字化程度有利于缩短城乡收入差距。杨怡（202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健康类人力资本、教育培训类人力资本、迁移类人力资本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贫困。Sehrawat 和 Giri (2016)指出普惠金融所具有的特性可以使得居民更容易享受到金融服务,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刘锦怡 (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成本低等特性,可以更好的在农村地区深入发展,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对金融的可触达性和就业机会,直接间接的减缓了农村贫困。丁建军 (2022)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资产的相对贫困,但是对于东部地区居民的资产相对贫困较中部和西部影响较弱。马卫刚等 (2022)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可以通过增加收入并对收入进行有效分配来缓解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吴本建 (2022)通过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贷约束、提高人力资本等方式来缓解多维度的相对贫困。罗振军 (2022)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的降低贫困,但是在医疗方面表现的相对较弱,并且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减贫效果大于东部地区。

2.1.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文献大都是基于 Mandira Sarma 和 Jesim Paris 的多维度评价框架。Mandira Sarma (2011)通过研究建立了以产品可触达性、可使用率以及覆盖深度为维度的体系。许多学者也通过借鉴这一维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这一评价体系缺乏对服务成本和便捷性因素的考虑。Rajani Gupte 等学者 (2012)弥补了 Sarma 体系中缺乏的因素,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了成本和便捷性的考虑,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完善。Ambarkhane 等(2016)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其他种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因素,并且从新的角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即:供给方、需求方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Sethy (2016)所构建指数体系关注的重点为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自动柜员机数量等基础设施;世界银行侧重于账户的储蓄、支付等银行业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普惠金融联盟主要是通过金融产品来构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主要用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和使用度等指标来衡量。

国内学者对普惠金融体系构建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焦瑾璞等 (2015)建立了以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使用情况以及服务品质三个主要维度构建体系,并运用 2013 年的数据,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杨军等 (2016)在

之前学者所构建的三个维度在内共 19 个指标的体系的基础上成功的构建了以县一级为单位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王伟程 (2015) 从供给方、需求方、外部因素三个方面构建中国普惠金融指数。

从构建体系的方式来看, 数字普惠金融与普惠金融有所不同, 需要更庞大的数据支撑。张晓燕 (2016) 在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中, 加入了互联网金融相关数据。目前, 我国学者大多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相关研究。这一指数由蚂蚁集团的大数据为基础编制而成, 2016 年首次发布, 时间跨度长达十年, 地区跨度包括我国内地 31 个省 (除港澳台)、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约 2800 个县 (含县级市和市辖区)。

2.2 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 消费一直是一个热点研究话题。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也为现今国内外的研究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研究。一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会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Jappelli 和 Pagano (1989)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该地区的消费信贷相比其他地区处于较低水平时, 则消费对当前收入的波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而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是导致消费信贷低的主要原因。张晓强等 (2017) 通过研究得出农村居民利用消费信贷途径缓解信贷约束压力, 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消费能力, 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罗楚亮 (2019) 认为农户的信贷约束会受农村金融的发展而不断降低, 农村居民可以通过金融服务获得更多的收益, 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还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Fisher (2010)通过进行抽样调查的方式分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居民预防性储蓄与收入的关系, 得出收入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当收入受到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时, 预防储蓄动机就越强烈, 从而影响消费。Torsten (1994)通过研究可以得出社会福利、保险等保障较高时候, 有利于释放低收入者的消费潜力, 降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而保留的储蓄, 降低预期风险估值, 促进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分配。Laurence et al (1982)认为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是消费增加的原因, 而并不是通过降低储蓄转化而来的。尚的等(2016)运用实证分析得出不同收入阶层受到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影响不同。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 他们的收入水平较高所受到的预防性储蓄较低; 中收入人群

受到未来不确定性较大,他们的预防性储蓄高于高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受到流动性约束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双重影响。三是互联网的发展和物流业的不断完善同时也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王琨媛、黄耀宇(2023)认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发展,可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从地区上看存在影响的异质性,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殷志高、任太增(2022)提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消费支出的增加,还可以使得消费结构升级,更大程度的释放了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孙月梅(2021)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不断加强物流产业链在农村地区的完善,有利于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彭自康(2022)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物流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水平越高促进作用越大。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研究。Dexun(2016)通过研究得出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会收到非农业发展的影响。Junko(2003)通过将整个消费市场设定为只有两种商品可以选择,从而得出经济发展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并且消费替代程度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王小华等(2016)提出由于农村居民消费在形成习惯后很难逆转。因而,消费对家庭的经营性、工资性以及财产性质的收入变动具有较高敏感度。张燕媛和谭涛(2014)认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发现农村居民对食品和衣着价格较耐用品和文化教育类的消费敏感度较差。杜蓉、乔均(2021)通过分析得出金融的发展对于不同消费层次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从农村居民消费层次分析,对生存型的影响最大,发展型影响最弱。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得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中西部高。

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Jie(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的多少与一个家庭的收入和资产有关。对于收入和资产相比较少的家庭促进作用更加明显。Jennifer T(2020)认为网购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消费对家庭收入形成了现期和长期两种影响模式。通过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家庭收入中因为消费而产生的现期影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新的消费模式使

得消费对收入产生了过度敏感性。涂颖清 (2022)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对于金融的可触达性和便利性, 对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城乡居民的促进效果不同, 对于城镇居民的促进效果大于农村居民的效果。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还有更大的空间。易行健、周利(2018)通过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所具有的特性助力消费成为更重要促经济发展的因素。范方志、彭田田 (2023) 基于全国层面的数据来构建模型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全国区域异质性方面入手分析, 西部地区生存性消费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黎翠梅等 (2021)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比传统普惠金融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还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农村的消费。向玉冰 (2022)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能, 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跨过阈值会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即: 第一产业占比越小,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越大。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缩短城乡消费差距。吕雁琴、赵斌(2019)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缩小消费差距, 并且作用效果优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蒋竹媛(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的缩小具有显著作用, 并且三个维度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效果明显。张彤进、蔡宽宁 (2021) 通过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的作用效果在全国具有区域异质性, 其中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方面东部的效果要低于中西部地区。

除此之外, 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区域异质性也有相关研究。郭华等 (2020)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中, 数字化程度影响最为明显, 根据区域异质性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较东部和中部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唐勇 (2021) 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均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并且同样认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李建伟 (2022) 通过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优化居民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优化的程度在城乡和区域中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与不同业务类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各不相同; 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4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跟随时代的潮流共同进步,构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所具有的特性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同时,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降低贫困。而从农村居民消费角度来看,农村居民消费主要会因为金融业、互联网和物流业的发展以及收入的变化而产生影响,并在区域和结构上呈现出发展的异质性。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问题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国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大都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并呈现出东中西影响效果的差异。但是,大多数文章主要从全国层面着手,很少有学者从某一省份出发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分析研究。同时,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促进作用较东、中部地区更具有显著性。

因此,本文从甘肃省的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各市(州)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存在的异质性和门槛效应进行研究。

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3.1.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其具有的特性可以让更多的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降低供求双方的成本。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是基于普惠金融所提出的。自普惠金融概念提出伊始,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力度,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目的是推动这一领域能够可持续发展,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普惠金融环境以及良性的竞争环境而努力。但是,由于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相互配合发展时,面临的一些限制和困难,使得普惠金融发展难以突破瓶颈。而此时,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为金融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金融业尝试与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相结合,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所具有的一些限制,这也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继续蓬勃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源泉。

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了我国农村居民接触金融服务的范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革新。而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普及,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多方面的改变。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有:第一,从普惠金融传统的线下支付模式转变到逐渐运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从传统的信贷模式转为网络消费信贷的模式,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借贷成本以及时间周期。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普及,也使得互联网理财以及保险也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人们的理财和保险意识,进而释放了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所产生的储蓄,更是让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深入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消费信贷、转账支付、保险服务、理财投资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用户群体的增加促使了余额宝和蚂蚁金服等平台开始兴起,这也为后续我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提供了大数据支撑。目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方式,主要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数主

要是由蚂蚁金服的数据为支撑。该指数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构建起来,包括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也不断形成了数字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发展模式,共计 33 个具体指标。全方位的衡量出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本文选取 2011 年-2020 年的甘肃省地级市(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分析,如表 3.1 数据列出了甘肃省各地级市(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值以及通过计算得出的各地市(州)十年来的平均值和中位数。

表 3.1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各市(州)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兰州市	66.56	109.06	145.58	158.54	193.77	211.9	238.73	248.45	262.69	272.78
嘉峪关	35.54	93.52	171.13	194.87	167.42	194.84	241.61	250.79	264.64	277.07
金昌市	57.83	97.00	118.26	171.38	175.49	196.43	220.07	227.01	240.05	251.70
白银市	40.33	77.11	109.30	137.86	159.97	178.82	207.81	215.53	227.35	238.20
天水市	32.79	69.85	104.37	128.71	147.95	169.02	193.54	198.68	210.78	223.58
武威市	31.32	67.54	101.74	129.00	144.62	171.95	198.32	203.41	217.6	228.96
张掖市	48.41	85.73	114.64	138.30	162.55	180.43	213.32	220.06	232.88	244.80
平凉市	28.31	72.06	101.78	130.99	153.05	169.04	196.20	203.73	214.47	226.50
酒泉市	60.79	92.89	131.93	144.95	180.25	195.86	226.55	237.32	251.98	263.50
庆阳市	34.62	68.26	93.15	142.67	162.01	172.17	198.27	209.13	216.44	227.62
定西市	19.53	55.52	105.15	111.86	140.96	162.14	191.67	195.20	208.85	221.40
陇南市	31.84	60.88	102.07	105.61	140.97	167.51	187.91	197.93	208.04	219.67
临夏	17.94	45.33	108.78	120.06	134.16	153.14	183.36	188.5	198.23	209.23
甘南	17.84	52.66	73.84	113.68	144.40	159.32	191.49	208.36	208.08	217.20
中位数	42.2	80.86	109.7	136.11	169.1	185.61	215.11	228.41	235.38	244.99
平均值	37.4	74.82	112.9	137.75	157.68	177.33	206.34	214.58	225.86	2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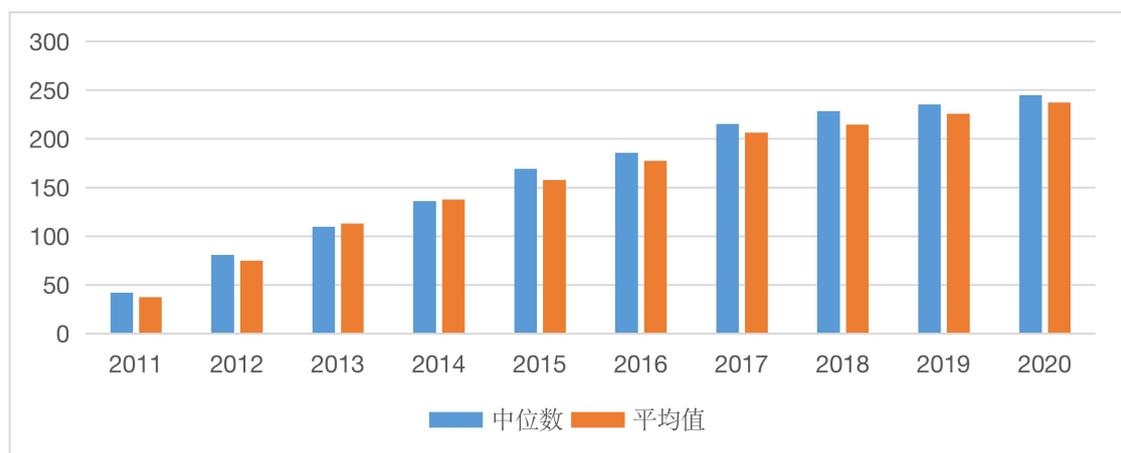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位数与平均值由作者计算得出)

根据表 3.1 数据分析可以得出, 201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低的为临夏回族

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别为 17.94 和 17.84，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进步，这十年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州）中增长最快的也是这两个城市，2020 年两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为 209.23 和 217.2，增长分别可达 10 倍和 11 倍。分析其原因是两个城市虽然一开始的经济水平相对甘肃省的其他城市相对较弱且受到了一定地理因素的限制，传统金融服务很难深入到这两个城市，大多数居民无法充分享受到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但是，随着近些年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经济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这两个城市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掀起探寻神秘古老的“丝绸之路”之风，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也越来越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对人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改变以及影响。

对 2020 年的数据分析，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张掖市以及酒泉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高于 14 个地级市（州）的平均值，是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几个城市。其中，嘉峪关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高为 277.07。因为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均 GDP 较高，所以更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发展。

同时，通过对甘肃省各个城市（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计算得出中位数以及平均数进行分析，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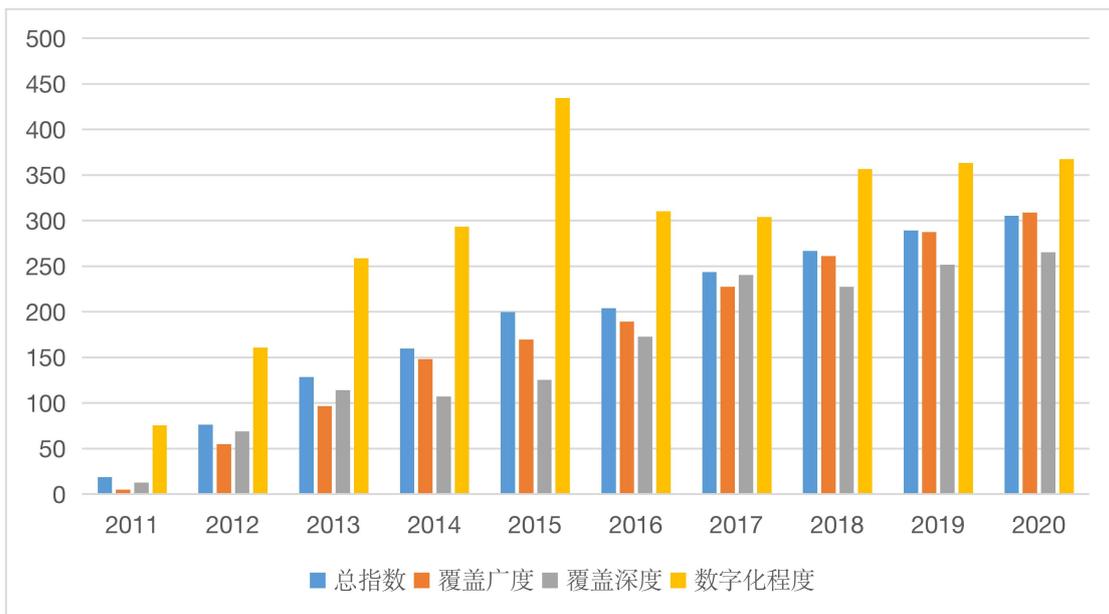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据计算得出

图 3.1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各市（州）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数以及平均值

对图 3.1 整体上分析可得，2011 年到 2020 年平均数以及中位数均有所增长，

各个城市（州）的中位数从 42.2 上升到 244.99，增长约 4.8 倍。平均值由 37.4 增加到了 237.3，增长约 5.3 倍，平均值和中位数差距较小。因此，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甘肃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并从整体上分析每一个市（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

通过对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以及三个维度指数分析，如图 3.2 所示。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图 3.2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以及结构

根据图 3.2 分析可知，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逐年增加，从 2011 年的 18.84 增加到 2020 年的 305.5，增长可达 15 倍。由此证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增长率分析，2011 年-2013 年增长速度最快，之后的增加则趋于缓慢。主要是因为 2011 年-2013 年是互联网发展的初期，这一阶段发展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迅猛。

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结构进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主要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主要通过支付宝账号绑卡用户比例等账号覆盖率来体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主要包括支付、保险、信贷、基金、投资以及信用这六个方面来体现；而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主要体现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移动性和便利性等。其中，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

覆盖广度增长最快，从 2011 年 4.99 增长到 2020 年的 308.87，增长了约 60 倍。由数据分析可知，2011 年-2014 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增长较快，得益于这段时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越来越广泛。2014 年之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增长率趋于平缓，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心逐渐从覆盖广度转移到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

其次，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增长较快，但增加幅度小于覆盖广度。从 2011 年的 12.76 增加到 265.35，增加约 20 倍，进一步证明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参与度不断增加。具体分析来看主要是保险、理财、投资等逐渐深入千家万户，被居民逐渐接受。人们也越来越接受和习惯了线上购买保险以及理财等金融产品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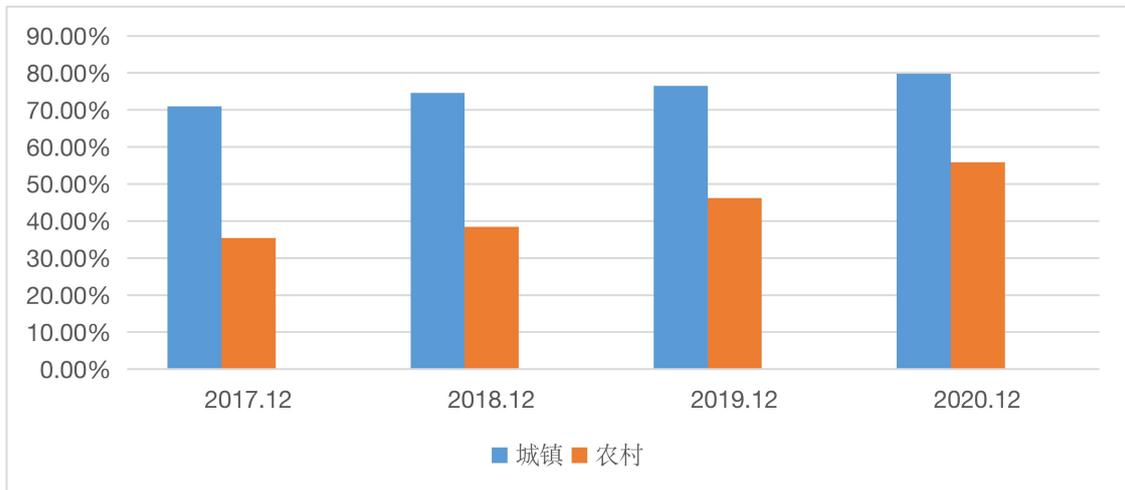
最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增长率最小，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增加了约 2.8 倍，其中从 2011 年 75.61 增加到 2015 年的 434.64，增加了约 3.7 倍，但是 2016 年和 2017 年数字化程度指数有所下降分别为 310.24 和 304.1，2018 年-2020 年依旧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截至 2020 年已达到了 367.36。

整体上看，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以及三个维度都有所提升。虽然数字化程度指数大于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但是较相对发达城市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这是因为当前仍然存在“数字鸿沟”的现象，年轻人更多的选择外出打工，农村地区“空心化”依旧存在。老年人的数字普惠金融参与度还有待继续提升。因此，还是要更加致力于增加线上交易业务的普及率，如：保险、理财等。要继续提升民众金融素养，增强金融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以及个性化，吸引居民增加对金融产品的购买支付，进一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甘肃省的蓬勃发展。

3.1.2 甘肃省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和使用情况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行业的支持。根据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得出，截至到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10.32 亿，比 2020 年 12 月增加了 4296 万。目前，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73%。同时，随着网络支付方式的不断兴起，我国通过互联网支付的用户已经达到 9.04 亿。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率也在逐年增加，截至到 2021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84 亿，城镇网民规模为 7.48 亿。城镇居民网民数量与农村居

网民存的数量上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图 3.3 中国互联网发展调查统计中的数据得出，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在逐年增加，但是城镇依旧大于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图 3.3 2017 年-2020 年我国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针对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的问题，我国工信部提出“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 2025 年实现行政村 5G 接通率达到 80%以上。而目前我国的各个村镇已经实现了每个村都有互联网，解决了之前通讯所存在的难题，互联网的发展为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原动力。

甘肃省近几年来互联网普及率也在逐年增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针对甘肃省农村地区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结果显示，2021 年农户宽带使用的覆盖率较 2020 年增长 1.08%，2021 年农户用智能手机的覆盖率比 2020 年增加了 0.88%，2021 年农户使用网上支付的百分比较 2020 年增加 3%。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促进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对互联网的使用了解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给人们日常生活中带来各种便利，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增强相关金融知识的学习。因此，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仍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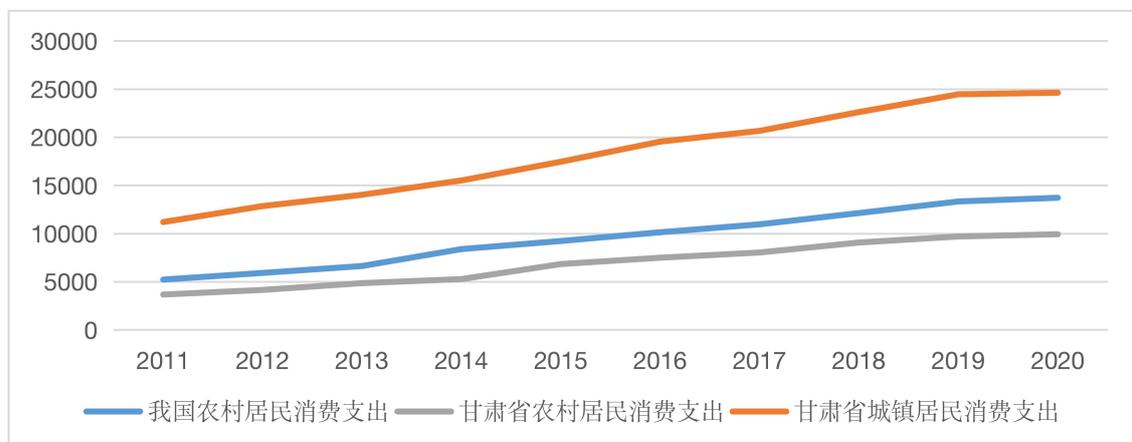
3.2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3.2.1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通过对 2011 年-2020 年我国与甘肃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整体数据对比分析,如图 3.4 所示。甘肃省各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是逐渐增加的,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大约增长 1.7 倍,2020 年达到最大值为 9923 元。从整体趋势上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在稳步提升,增速一直保持平稳。

通过对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分析,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从 2011-2020 年整体上同样处于上升趋势。将甘肃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对比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一定的差距。从 2011 年到 2020 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了 38.8%。其中,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距最大的为 2020 年,二者相差可达 14692 元。

从全国层面分析,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从 2011 年 5221.1 元增加到 2020 年 13713.4 元,增长约 1.6 倍。其中 2017 年-2018 年增长最多,达到 1994.7 元,增长率最高的是 2013 年-2014 年,增长率约为 26.5%。将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对比分析,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体上都是上涨的趋势,但是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一直低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中,相差最大的是 2020 年,差距达到 3790.4 元。因此,虽然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一直在稳步增加,但是仍然具有很大潜力可以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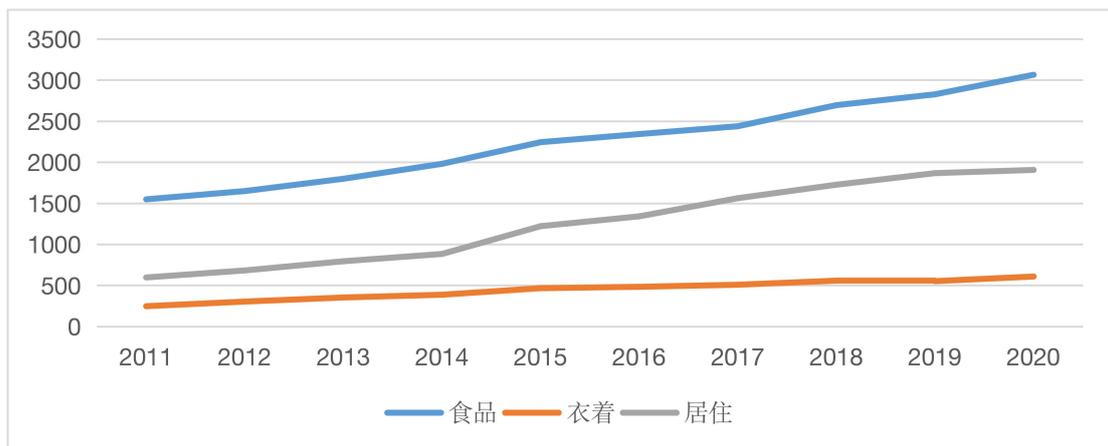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年鉴、甘肃发展年鉴

图 3.4 2011 年-2020 年我国与甘肃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

3.2.2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是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八类支出归纳分成生存型以及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其中，居民生存型消费主要为食品、衣着、居住，居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为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因此，本文对甘肃省消费结构现状进一步进行分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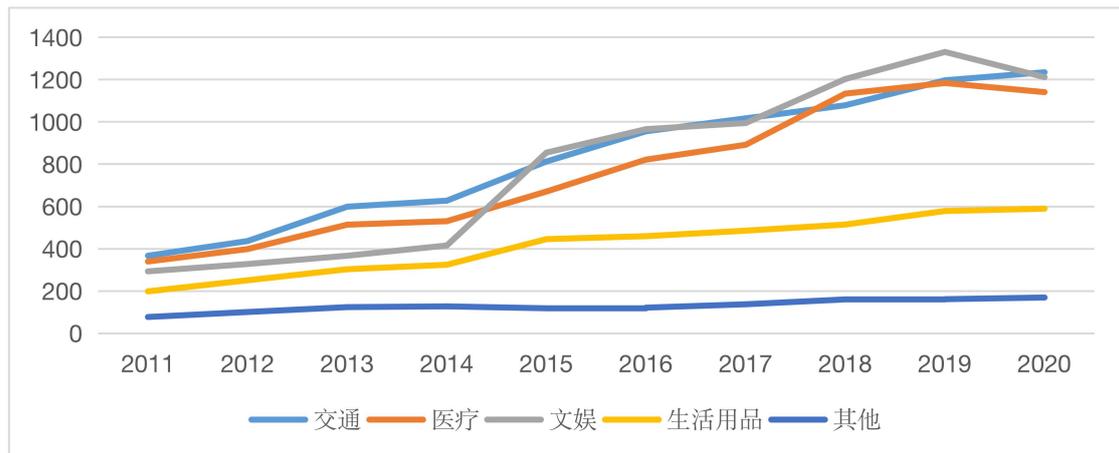
首先，通过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的数据分析，如图 3.5 所示，甘肃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中食品花费最多、居住支出次之、衣着最少。但是从增加比例来分析，居住虽然在生存型消费中花费占比为第二，但是增长速度最快，近十年增长约 2 倍，衣着虽然占比最少，但是增长比例可达 1.5 倍。食品的增长较两者比较为缓慢，可达到 1 倍。



数据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图 3.5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

其次，通过对甘肃省农村居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分析，如图 3.6 所示。文娱支出增长最快，2020 年支出可达 1211 元，较 2011 年增加约 3.1 倍。交通通讯支出增长次之，可达 2.4 倍。医疗支出 2020 年为 1140 元，较 2011 年增长约为 2.36 倍。生活用品及服务增长最少，但也达到 2 倍。



数据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图 3.6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

整体上看，甘肃省农村居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占总消费的占比逐年增加。从对生存型消费数据分析，食品的支出占比仍大于衣着和居住，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依然大于衣着和居住需求。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数据分析可得，文娱增长的最多，证明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满足了基础需求之后，开始对精神境界的富足有了更深层次的追求。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甘肃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逐渐转为享受和发展型消费，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占比逐渐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

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机制

4.1 相关理论基础

4.1.1 普惠金融相关理论

(1) 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是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从银行成立之初，人们便开始关注并探究经济增长与货币之间有何种联系，但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对生产要素的研究，这一研究已经不能满足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把整个金融体系融入到经济分析研究的框架之中，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涌现了很多经济学家，如罗纳德·麦金农、格力等。经过这些经济学家夜以继日的不断探索，金融发展理论最终诞生。随着这一理论的创新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深化理论、金融结构理论、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等为代表的理论。

金融深化理论，又名金融自由化理论。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对利率和汇率等进行限制以得到对本国金融活动的管控效果，但是这样会使得两者不能准确的反映出本国和外国货币之间的供求关系。如果利率被压低会导致信贷资金资源配置率降低、储蓄者减少定期存款等储蓄。最终导致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可贷资金减少，企业可用资金减少，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降低对经济的干预，采用宽松的利率和汇率等政策，提升金融发展的自由度，并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和金融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结构理论。雷德蒙·W·戈德史密斯 (L.Goldsmith) 通过研究发现金融结构的变化对金融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他通过运用 100 年来 35 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用金融相关比例 (FIR) 来衡量。如果某一国家的相关比例越高，表明其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是自 La Porta, Lopez, Shleifer 和 Vishny 在开创了法律与金融研究这一领域之后得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各位学者开始关注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便开始了对新

制度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该理论认为，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等发展更完备、更成熟、更稳定，那么金融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效果就越发有效。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将社会环境因素纳入到整个理论分析之中，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金融排斥理论

该理论是指有一部分人群因为某些原因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而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一是这部分人很难接触到金融服务；二是这部分人如果要享受金融服务就会使得金融机构付出更多的金融资本。这一现象最早被发现是在英国和美国，两国的金融机构为了发挥其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关闭了很多偏远乡村地区的服务网点，只为了“优质的大客户”进行金融服务。这就使得金融发展的地区不平衡表现的更加明显，与普惠金融所产生的效果和初衷相去甚远，使得金融排斥现象就此产生。

金融排斥可以分成多个维度来分析。首先，Leyshon & Thrift 最先提出地理排斥，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获得的金融服务程度也不同，地理位置偏远等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更小。同时，Kempson & Whyte 提出金融排斥还会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金融排斥中除了地理排斥外还有评价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自我排斥等六个维度。

分析产生这种排斥的原因有很多，从需求和供给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需求方面分析。金融机构会针对不同的需求者类型，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比如根据每个需求者所拥有的资产财富、收入水平或者生产经营情况，来判定是否对某些表现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其次，从供给方面分析。一方面，金融机构对流动性风险和道德风险评估值较低的地区缺乏服务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因素导致了某些网点的设置成本将高于平均值，金融机构将会放弃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进行金融服务，这也进一步加大了金融排斥的生成。

(3) 包容性增长理论

这一概念由 2007 年被提出，它是指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能够一直协调并且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一理念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让更多之前未享受过经济总体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人也一并加入，对整个社会缩短了贫富差距，促进了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效果。

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主要包括：一是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为经济增长带来外部经济，从而可以达到“普惠”的效果，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体验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二是可以进一步致力于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发展，避免整个社会存在的排斥效应。

(4) 长尾理论

由克里斯·安德森提出，该理论是指一些被企业经常忽视的非主流的消费群体比主流的消费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在企业的主要收益来源中占据很大比例。如果用坐标轴表示这一规律的话，那么横轴代表市场消费群体，纵轴代表商品的需求量对市场的影响的描述。因此，可以得到一条有着拖尾特点的曲线。这一曲线的最开始部分为主流市场，末尾部分代表非主流市场。由于这些非主流市场的利润具有“薄利多销”的特点，其基数庞大，在边际成本下降的条件下，最终可以获得和头部市场比拟的巨大收入。这一理论也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它很好的提示企业要不断的创新技术，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1.2 居民消费相关理论

(1) 收入决定理论

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在对消费的研究中考虑收入因素，并提出绝对收入假说，其认为收入水平对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促进了消费支出的增加。同时，凯恩斯认为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是减少的，这也证明了消费水平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缺少对预期收入变化的考虑，只考虑当前对消费的影响，这也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完善。

相对收入理论。由杜森贝利提出，这一理论通过分析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做决策时，其行为会受到示范效应、棘轮效应的影响。其中，棘轮效应指的是人们的消费水平会存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情况。收入提升使得消费水平的升级，人们会对现有的消费水平产生习惯。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因为一系列因素而“降级”，但是还会保持原来的消费水平和高度。示范效应则是指自己的消费习惯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会随着周围人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是这两种对消费者心里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对的，因此也被成为相对收

入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是由莫迪利安尼和布伦伯格在欧文费雪的效用最大化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在一生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分别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以及老年时期。处于青年时期的群体，大多都具有风险爱好者的消费特点，很少部分用作储蓄，消费占比较大，甚至会产生一些超前消费；而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加，收入通常也会不断增加，这部分增加的收入以及减少的部分消费用于储蓄和偿还之前的超前消费，并且用于合理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到了老年时期，大多数人依靠年轻时候的储蓄来进行生活。理性消费者会对自己的收入进行合理规划分配，使得效用最大化。

持久性收入理论。由弗里德曼提出，拥有持久收入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长期收入来确定现期消费水平。因此，该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对未来预期收入等因素的考虑来决定现在的消费支出水平。

随机游走假说。霍尔将理性预期方法论加入到生命周期假说以及持久收入假说之中，其认为满足这两个假说成立的同时，将理性预期因素加入也是成立的。理性预期更重视的是未来政策的变动，如果对未来的收入与资产的估值和消费的预期都是理性的，那么过去的信息无法影响其消费，因此，这种消费被称之为“随机游走”。

(2) 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由利兰德提出，其主要内容为由于未来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会对消费者未来的消费支出边际效应的判断产生影响。消费者会未雨绸缪，当预期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升时，会减少现在的消费支出形成更多的储蓄以应对未来的消费。这体现出了消费者的预防动机，在对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增加预防性的储蓄。同时这一理论也存在三个潜在的观点：一是消费者会根据预期来调节现期消费，具有预防性动机。二是金融市场不能够提供可以让消费者跨期借贷的工具和产品。三是消费者的收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 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理论最早是由托宾（1971）所提出，他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毫无例外的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约束。当人们的自身可支配收入无法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时，会减少相应的消费支出，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消费支出。当消费者消费水平受到影响时，会反过来促进储蓄的增加。流动性约束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些国家的家庭因为缺少不动产等资产做抵押，很难申请到贷款来缓解当前的现金约束；其次，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影响了居民获得信贷；最后，信贷市场产品缺乏多元性，很多消费者的信贷无法得到满足而继续处于流动性约束状态。

4.2 影响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将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相结合为社会各个阶层在支付、信贷、保险以及理财方面提供服务。因此，本文基于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相关理论，从数字化支付途径、消费信贷途径、保险途径、理财途径来进行梳理分析影响分析。

4.2.1 数字化支付途径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城镇居民的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户带来便捷地支付方式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村居民的“购买约束”，使得农村居民改变了原来的消费方式。从传统的奔走购买，到现如今的使用互联网为工具进行购买的新型交易方式，大大降低了时间成本以及购买成本。数字普惠金融支付的便捷性，降低了现金约束，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使用虚拟化的支付方式感受到的心里损失要低于现金支付方式获得心里损失感。这也是塞勒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核心观念，即：由于账户之间存在着非替代效应，第三方支付等虚拟化支付方式与现金支付方式处于不同的账户，两个账户之间相互独立，第三方支付等虚拟支付方式使消费者对金额的敏感度降低，使得消费者的支出较之前在传统支付方式下的支出会有所提升。裴辉儒、胡月（2020）通过研究得出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普及和多元化发展，这一新的支付方式对于我国居民的消费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可以进一步刺激消费。王晓彦、胡德宝（2017）通过对不同支付方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移动支付可以进一步刺激消费，其中蚂蚁花呗的支付方式所产生的刺激效果更加明显。

4.2.2 消费信贷途径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消费信贷可以实现消费的跨时间段的优化消费,增加了消费的性价比。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蓬勃发展,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具有一定的信心。因此,更多的农村居民会逐渐释放出消费潜力,还会选择一部分合理的超前消费,从而产生消费信贷。消费的不断增长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居民增收,农村居民会运用获得的收入进一步用于消费和偿还信贷,形成良性循环。同时,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农村居民会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自身支付能力问题而信贷受限,这就会对农村居民进行正常消费借贷产生一定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降低传统消费信贷的门槛,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信贷来满足当前以及未来的消费,有效覆盖到更多人群,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运用大数据收集到农村居民消费等信息,有利于完善信用体系,降低信用风险,也让更多的农村居民接受这种消费方式,转变了对传统消费信贷的固有印象,对未来的消费以及消费信贷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进一步缓解农村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它在互联网等大背景下,增加了消费者对与消费信贷的可得性,从而满足了消费者当期和未来的消费。

4.2.3 保险途径

农村居民的收入有时会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心理。因为地域的限制以及观念上的不同,导致很多的农村居民较城镇居民享受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较小。保险具有防范未来不确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散风险。保险给予农村居民一定保障,比如农村居民参加新农合保险,这一保险所提供的补助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心理。王极等(2023)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而提出新农保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在区域异质性上看,对于西部地区农户的作用更加显著。金露、曲秉春、李盛基(2019)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农村居民参加保险对于促进消费具有正向意义,并且可以释放预防性储蓄,增加家

庭生产性投资支出。戴序（2019）提出农村金融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这可以通过保险机制的有效建立来实现。

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较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居民的保险意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多元化让农村居民有了更多保险产品的选择空间。线上购买缴费的方式，降低了购买门槛。保险也逐渐深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比如网购时候所运用的运费险可以给予我们购物的保障，使得更多人放心网购，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支出。

4.2.4 理财途径

金融理财的财富效应会使得农村居民在乐观预期未来收入的同时增加当期的消费。金融理财所具有的收入效应可以使得农村居民有资本用增加消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的理财选择。便捷地理财方式以及多元化的理财产品可以获得比之前传统金融更多的收益，同时还可以满足日常的实时支付。数字化赋能理财产品改变了原有的理财模式，促使传统银行机构通过降低存款与贷款的利息差给予民众优惠，从而提升竞争力。理财产品的丰富多样让居民有更多适合的选择，增加了理财的自由度，推动农村居民的参与度，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现如今的理财产品更加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因地制宜地推出结合当地文化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的相关产品，这一发展也体现了金融创新的融入，从而可以吸引农村居民增加投资并取得收入。

4.2.5 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根据普惠金融理论和消费理论并结合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发展现状提出影响作用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从数字化支付途径、消费信贷途径、保险途径、理财途径使得农村居民改变消费习惯与模式、缓解信贷约束、降低投资性储蓄以及增加投资性收入，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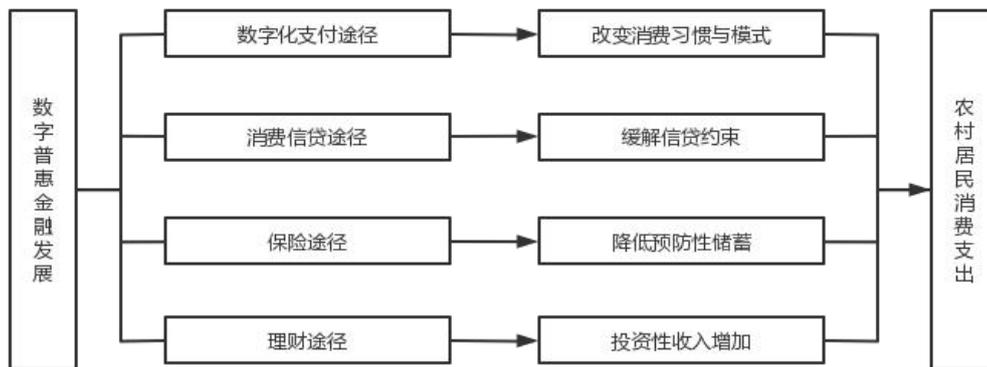


图 4.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机制流程图

4.3 研究假设

通过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分析，基于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理论的研究，并根据以上的影响机制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便捷地支付手段，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并且根据其特点降低了消费信贷的门槛。结合居民消费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释放了预防性储蓄，增加了投资性收入，有利于提升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提出假设 1。

假设 1: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由于各个市（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程度不尽相同。因此，根据这个角度为切入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的不同，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触达范围、参与程度以及便捷程度方面，对甘肃省各个市（州）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提出假设 2。

假设 2: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异质性。

由于各个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的不同，会造成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也有所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在各地区发展的进程也不相同。第一产业占比越小，证明其二、三产业发展越成熟，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其他地区更为完善，农村居民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接触越多，更能进一步带动农村消费。由此，本文基于以上考虑，进行门槛效应分析，提出假设 3。

假设 3: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门槛效应。

5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

5.1 变量及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5.1.1 变量选择

变量的选取关乎着实证结果,本文分别选取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为解释变量,并选取四个控制变量,即:财政支农、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

(1) 被解释变量。本文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进行研究。借鉴涂颖清、万建军(2022)运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全国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选取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NX)为被解释变量。并且运用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形式进行数据处理,从而减少误差。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主要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选取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常使用的基础数据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运用广泛,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本文选取这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样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了减小误差,同样将该变量取对数。

(3) 控制变量

GOV即财政支农。本文借鉴黄秋萍、胡宗义(2017)的方法,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财政支农的力度。该比值越高,农村居民需要自行投资到农林水事物中的金额越少,可用于消费的金额就会越多,有利于释放更多的消费。

UR即城镇化率。本文借鉴韩晓宇(2017)的做法,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和观念受到城镇居民的影响越大,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越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示范效应”,从而进一步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

CGAP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有:泰勒指数、基尼

系数以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本文借鉴钱水土、章欣楠 (2021)做法选择比值的方法来处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比值越小, 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小, 越有利于农村居民产生消费。

IS 即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产值代表了农业生产活动, 第一产业比值的占比越小, 证明该地区第二、三产业占比越多, 即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善, 与城市建设更为相似。本文借鉴谭燕芝、彭千苒 (2018) 的方法, 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因此, 本文选择控制变量为第一产业与 GDP 的比值。

5.1.2 数据来源

为了使得整体的实证分析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均通过运用甘肃发展年鉴、各市统计公报以及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核心解释变量、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制分析中运用的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各级指数, 均取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因为地市 (州) 的数据较为完整, 所以本文的时间跨度选择为 2011 年-2020 年的甘肃省地级市 (州) 数据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5.2. 模型设计

5.2.1 普通面板模型

通过参考向玉冰 (2020) 对于全国层面的研究方法, 综合上文提到的假设, 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本文运用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的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 通过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得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适合本文所研究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消费之间的关系, 模型如下:

$$\ln NX_{i,t} = \beta_0 + \beta_1 \ln DIFI_{i,t} + \beta_i X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5.1)$$

$NX_{i,t}$ 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DIFI_{i,t}$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X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 u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i 和 t 分别表示不同地区和时间。

β_0 为常数项, β_1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 β_i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同时, 在固定效应的模型的基础上,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异质性。

5.2.2 门槛效应模型

第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会影响到当地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和习惯, 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更加完善, 对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且可以更好地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本文借鉴向玉冰 (2020) 选取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对全国层面进行分析的方法。根据甘肃省各个地级市 (州) 的产业结构的不同, 即: 第一产业占比为门槛变量时, 研究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门槛效应, 单一门槛模型如下:

$$\ln NX_{i,t} = a_0 + a_1 \ln DIFI_{i,t} * I(IS \leq \gamma) + a_2 \ln DIFI_{i,t} * I(IS > \gamma) + 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2)$$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 γ 是待估算的门槛值, $I(\cdot)$ 是示性函数, 当括号内的表达式为真时, 则取值为 1, 反之为 0。 a_0 为常数项, a_1 、 a_2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间的系数, a_3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

5.3 样本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上文选取的变量描述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得到表 5.1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 5.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数	lnNX	8.830	0.441	9.708	7.789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	lnDIFI	4.924	0.610	5.624	2.881
控制变量	财政支农	GOV	0.171	0.058	0.312	0.025
	城镇化率	UR	0.472	0.201	0.937	0.21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CGAP	2.996	0.694	4.626	1.809
	产业结构	IS	0.161	0.081	0.307	0.0132

数据来源: 甘肃省发展年鉴、各市统计公报以及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通过对表 5.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可得, 甘肃省各个地级市(州)的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差距, 最大值为 9.908, 最小值为 7.789, 标准差为 0.441。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之间的发展也存在不同,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2.74。除此之外, 各市(州)财政支农、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财政支农支出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0.271, 城镇化率最大值为 0.937, 最小值为 0.214, 平均值为 0.472 与标准差相差约为 0.27。城乡收入差距比值的最大值为 4.626, 最小值为 1.809, 产业结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约为 0.3。

5.4 基准回归结果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存在遗漏项, 采用分步回归。并通过选择稳健标准误回归, 来消除异方差影响, 所得结果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lnNX	lnNX	lnNX	lnNX	lnNX
lnDIFI	0.490*** (12.67)	0.446*** (10.94)	0.212*** (5.98)	0.197*** (4.66)	0.192*** (4.65)
GOV		1.723** (2.84)	0.441 (1.25)	0.233 (0.86)	0.130 (0.48)
UR			4.280*** (10.59)	4.082*** (9.53)	4.252*** (9.69)
CGAP				-0.106 (-1.07)	-0.073 (-0.76)
IS					-0.852* (-2.01)
_cons	6.417*** (33.69)	6.341*** (32.58)	5.691*** (35.68)	6.214*** (11.99)	6.217*** (11.72)
Obs	140	140	140	140	140
R-square	0.788	0.813	0.904	0.906	0.909

注: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t 值。

由表 5.2 回归结果来看, 第 1 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1%的检验条件下显著, 系数为 0.490。在逐个添加控制变量财政支农、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的过程中,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回归过程中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其系数值分别为 0.446、0.212、0.197、0.192。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回归之后可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系数为正, 并且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就增加 0.192 个百分点, 通过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假设 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 城镇化率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 4.252。证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提升, 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模式, 发挥了城镇居民消费所具有的“示范效应”, 从而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产业结构在 10%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其系数为-0.852。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产业占比越小, 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越大, 也意味着二、三产业更加发达, 更多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认识与接受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为负、财政支农的系数为正, 但是不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5.5 稳健性检验与影响机制分析

5.5.1 内生性检验

通过对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 (州) 的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减轻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但是仍然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误差项因素的影响, 从而使得回归的结果不够准确; 同时, 甘肃省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程度不同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选择采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对基本回归进行内生性检验, 运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为工具变量放入解释变量中获得动态面板模型:

$$\ln NX_{i,t} = \lambda_0 + \lambda_1 \ln NX_{i,t-1} + \lambda_2 \ln DIFI_{i,t} + \lambda_3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5.3)$$

$NX_{i,t}$ 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NX_{i,t-1}$ 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滞后一期, $DIFI_{i,t}$ 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X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 μ_i 为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下表 i 和 t 分别表示不同地区和时间。 λ_0 为常数项, λ_1 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滞后一期的系数, λ_2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 λ_3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

通过对基准回归进行内生性检验, 所得结果如表 5.3 所示。

表 5.3 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内生性检验

	(1)	(2)	(3)
	lnNX	lnNX	lnNX
L.lnNX	0.654*** (7.01)	0.702*** (9.23)	0.622*** (5.71)
lnDIFI	0.169** (2.77)	0.139** (2.41)	0.135** (2.29)
GOV	0.296 (0.93)	0.008 (0.04)	0.831 (0.90)
UR	0.322* (1.79)	0.043 (0.37)	0.296 (0.95)
CGAP		-0.080*** (-5.25)	-0.086*** (-4.97)
IS			-0.037 (-0.12)
_cons	2.076*** (4.31)	2.227*** (5.46)	2.722*** (4.37)
AR(2)	0.550	0.377	0.498
Obs	126	126	126
Hansen-J	0.126	0.105	0.219

注: ***,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t 值。

通过对表 5.3 结果分析可知, 第一列中加入控制变量财政支农和城镇化率,

所得结果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为 0.654。第二列在第一列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得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全部为正，估计系数为 0.702，第三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估计系数为 0.622。整体上分析，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在 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与上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AR(2)的 P 值均大于 0.1。由于本文运用的是动态面板系统 GMM 检验，Hansen-J 检验的值在 0.1-0.25 之间。因此，整体上通过检验。通过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中的结论可以得出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受到之前消费习惯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具有“棘轮效应”。

5.5.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的个数而改变变量指标体系的方式来验证模型稳健性。在稳健性检验时通过添加老年抚养比率(LF)这一控制变量的方法，这一比率运用甘肃发展年鉴中的数据，通过回归得出表 5.4 结果。

表 5.4 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lnNX	lnNX	lnNX	lnNX	lnNX	lnNX
lnDIFI	0.490*** (12.67)	0.446*** (10.94)	0.212*** (5.98)	0.197*** (4.66)	0.192*** (4.65)	0.191*** (5.64)
GOV		1.723** (2.84)	0.441 (1.25)	0.233 (0.86)	0.130 (0.48)	0.190 (0.74)
UR			4.280*** (10.59)	4.082*** (9.53)	4.252*** (9.69)	3.093*** (3.64)
CGAP				-0.106 (-1.07)	-0.073 (-0.76)	-0.065 (-0.62)
IS					-0.852* (-2.01)	-1.097* (-2.05)

续表 5.4

	(1)	(2)	(3)	(4)	(5)	(6)
	lnNX	lnNX	lnNX	lnNX	lnNX	lnNX
LF						2.326*
						(1.90)
_cons	6.417***	6.341***	5.691***	6.214***	6.217***	6.455***
	(33.69)	(32.58)	(35.68)	(11.99)	(11.72)	(10.78)
Obs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R-square	0.788	0.813	0.904	0.906	0.909	0.917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对表 5.4 结果进行分析，从解释变量来看，在增加了控制变量之后，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 0.191 并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甘肃省农村居民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每增加 1%，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191 个百分点。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并且系数符号相同，说明整个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发现所有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说明控制变量也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分析新增变量老年抚养比率，其在 10%的显著水平下，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老年抚养比率增加会促进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加。

5.5.3 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理论部分分析得出，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研究主要是从数字化支付途径、消费信贷途径、保险途径以及理财途径来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与模式、缓解消费信贷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以及投资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对影响机制的作用效果进行分析，运用北京大学金融研究学院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二级指标中，支付指数、保险指数以及信贷指数进行分析，为了减少误差，对这三个指数同样选取对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表 5.5 所示。考虑到数据的完整和统一，投资指数数据较新，包含的年份较少，则不对投资指数进行分析。

表 5.5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机制分析

	(1)	(2)	(3)
	lnNX	lnNX	lnNX
lnPayment	0.049*** (3.73)		
lnInsurance		0.068*** (3.33)	
lnCredit			0.129** (2.31)
GOV	0.001 (0.00)	-0.022 (-0.07)	0.143 (0.43)
UR	5.170*** (10.31)	5.071*** (13.62)	4.623*** (5.49)
CGAP	-0.150 (-1.69)	-0.125 (-1.37)	-0.166* (-1.85)
IS	-1.106** (-2.53)	-0.883** (-2.36)	-1.142** (-2.40)
_cons	6.787*** (14.24)	6.594*** (13.52)	6.788*** (12.87)
Obs	138	139	135
R-square	0.889	0.895	0.908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由表 5.5 结果分析, 第一列支付指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 0.049, 证明支付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就提升 0.049 个百分点。第二列为保险指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 0.068, 证明保险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促进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068 个百分点, 第三列为信贷指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 信贷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129 个百分点。因此,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 支付途径、保险途径以及信贷途

径都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影响,数字化支付指数的提升改变了农村居民原有的消费方式,使得农村居民日常缴费更加便利,降低了对于现金的敏感度,有利于促进消费。同时,网上保险购买可以释放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农村居民对保险的选择种类,从而可以进一步分散风险,给予农户一定的保障。尤其是甘肃省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大,进一步带动了农村居民投保的积极性。而信贷支付指数的提升可以缓解农村居民的资金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促进了消费的增加。

5.6 异质性分析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建立是由三个维度构成,即: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分别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触达性、用户参与度以及便捷性,这三种影响因素对于甘肃省各个地级市(州)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为了更好的研究分析这三种因素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的异质性。本文借鉴马亚明、周璐(2022)异质性分析的做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维度,即: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各个地级市(州)对应的各个分维度的指数构成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所得结果如表 5.6 所示。

表 5.6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结构异质性分析

	(1)	(2)	(3)
	lnNX	lnNX	lnNX
lnBreadth	0.061 (1.57)		
lnDepth		0.078* (1.82)	
lnLevel			0.087*** (4.34)
GOV	-0.140 (-0.39)	-0.109 (-0.32)	-0.108 (-0.28)

续表 5.6

	(1)	(2)	(3)
	lnNX	lnNX	lnNX
UR	5.807*** (11.08)	5.757*** (11.12)	5.732*** (11.69)
CGAP	-0.223** (-2.36)	-0.223** (-2.33)	-0.215** (-2.39)
IS	-1.049** (-2.38)	-1.112** (-2.44)	-1.157** (-2.57)
_cons	6.660*** (12.83)	6.613*** (12.35)	6.516*** (13.00)
Obs	140	140	140
R-square	0.884	0.883	0.884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t 值。

对表 5.6 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 在 10%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其估计系数为 0.078,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深度每增加 1%, 则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会增加 0.078 个百分点,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性,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种类更多的金融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 进一步释放了消费, 减少流动性约束。同样,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数字化程度对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 其估计系数在 1%的检验水平下为 0.09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数字化程度每增加 1%, 则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094 个百分点。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越高, 更能体现数字普惠金融便捷性的优势, 越可以帮助农村地区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但是, 实证分析数据反映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覆盖广度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无明显显著效果。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触达性, 目前甘肃省农村地区仍存在数字鸿沟等问题, 覆盖广度的不断增加不能够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虽然拥有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账户, 但是不能够完全反应出居民的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的特性还有待更好的体现。

因此，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效果不明显。

5.7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5.7.1 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运用 Bootstrap 方法对整个模型进行处理并对整个样本数据进行 500 次重复抽样，由此来判断整个样本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对存在门槛的数量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5.7 所示。

表 5.7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RSS	MSE	Fstata	Prob	Crit10	Crit5	Crit1
单一门槛	1.1433	0.0088	23.22	0.0120	14.8098	17.8272	23.6873
双门槛	0.9450	0.0073	27.27	0.2060	44.0822	54.7994	69.7302
三门槛	0.8647	0.0067	12.07	0.4940	40.5657	46.7080	67.3161

根据表 5.7 结果可知，单一门槛下 P 值为 0.012 小于 0.05 所以存在单一门槛。由于双门槛以及三门槛的 P 值为 0.2060 和 0.4940 均大于 0.05，未通过 P 值的检验。因此，本文将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来探究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中只存在单一门槛。

接下来通过运用最大似然比估计的方式检验门槛值是否真实，如图 5.1 结果所示。虚线处 LR 为 7.35，曲线为门槛变量似然比值。在检验中，门槛值为 0.0499 时，在 (0.0292, 0.0550) 区间内，似然比值 LR 小于 5% 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所得门槛值为真实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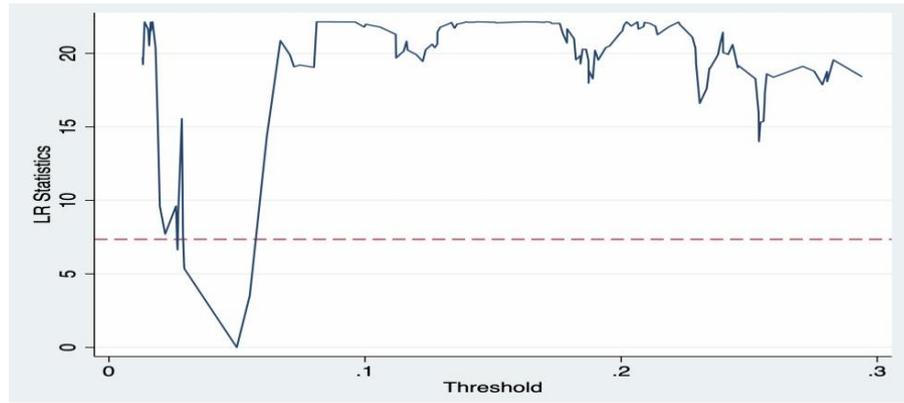


图 5.1 门槛效应估计

因此，通过表 5.8 门槛值估计结果可得门槛值为 0.0499，所处的区间 (0.0292-0.0550)。上限为 0.0550，下限为 0.0292。

表 5.8 门槛值估计结果

model	Threshold	Lower	Upper
Th-1	0.0499	0.0292	0.0550

5.7.2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将整个门槛效应的结果与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如下表 5.9 所示。通过对数据分析可知，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产业结构的两个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作用效果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随着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促进作用的绝对值由大变小，即：从 0.272 减少到 0.169。表明在不同产业结构水平下的甘肃省各个地级市（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同。通过分析得出：无论第一产业占比是位于实证结果的门槛值以上或以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都具有促进作用，且每个区间都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从分段的角度分析，当某一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小于 0.0499 的时候，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1% 的显著条件下的系数为 0.272，即：此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就促进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272%；当某一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大于 0.0499 时候，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1% 的显著条件下的系数为 0.169，即：此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169%。第一产业占比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反之，则影响越小。第二、

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其农村居民所受到的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较大，并且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相对较高，更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中其他控制变量系数以及显著性进行分析，城镇化率在 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表明这一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影响。

表 5.9 基准回归结果和单一门槛值下回归模型结果比较

	(1)	(2)	(3)
	lnNX	lnNX	lnNX
lnDIFI	0.490*** (12.67)	0.192*** (4.65)	
GOV		0.130 (0.48)	0.146 (0.45)
UR		4.252*** (9.69)	4.438*** (11.53)
CGAP		-0.073 (-0.76)	-0.103 (-1.64)
IS		-0.852* (-2.01)	-0.693* (-1.84)
lnDIFI(IS≤Y)			0.272*** (8.54)
lnDIFI(IS>Y)			0.169*** (6.23)
_cons	6.417*** (33.69)	6.319*** (18.63)	6.223*** (19.84)
Obs	140	140	140
R-square	0.788	0.882	0.923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为农村居民带去了很多便利,更多的农村居民可以运用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享受到金融服务。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首先,明确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内涵,梳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将数据整理成图表的形式,清楚地反映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让结果更加直观。其次,通过对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得出影响机制,即:从数字化支付途径、消费信贷途径、保险途径以及理财途径,分别从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与模式、缓解消费信贷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以及投资性收入方面产生影响。并结合以上现状和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异质性研究,运用门槛模型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第一,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同时,在对以上实证分析运用系统 GMM 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会受到之前消费习惯的影响,消费具有“棘轮效应”。第二,通过对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构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以及使用深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果并不具有显著效果。第三,通过运用门槛实证分析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单一门槛,在不同产业结构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尽相同,门槛值在 0.0499 以上的地区,也就是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该地区的影响效果也就越小;反之,在门槛值以下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该地区的影响越大。

这一地区第二、三产业占比越大，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更易受到影响。因此，通过运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共同分析可以得出，消费习惯对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也促进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同时，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农村居民可以更便捷的接触到更加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更与城市接轨，这同时也与异质性分析结果相符，即：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能促进农村居消费水平提升。

6.2 政策建议

通过对以上的研究进行分析得出，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有利于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发展当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也会引起以下问题。比如：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未完全成熟，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第二，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人群金融知识的积累有限，可以选择分散风险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第三，数字普惠金融所具有的特性虽然能够提高人们的参与程度，但是也容易产生一些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

综上，本文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部门联动加强监管、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以及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技能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意见。

6.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加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提升产品以及服务的多样性。如果要缩小各个城市之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距，就要因地制宜地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成本和风险，各地发展结合当地特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各个城市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降低各地的金融“差距”，有利于居民同质化的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做到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让金融更加“普惠”。

由于互联网技术更新发展较快，为了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加强互联网科技的硬件建设，增加互联

网在各个地区的覆盖广度，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为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的在农村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继续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率等。努力实现“村村通”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逐步实现道路、用电、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全覆盖。这一发展为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为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更好的服务村民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反向促使金融机构提升处理金融科技相关问题的能力，推动数字金融企业增加与农村居民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

6.2.2 各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步的同时，各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由于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防范意识不够强烈，很容易受到财产上的损失，造成不利的后果。这就需要各部门联合加强管理。第一，需要各级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覆盖广度和深度。同时，增加农村居民的防范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可以定期定时派出村干部或者民警进行大范围宣讲，告诫民众警惕身边的诈骗新招数。普及反诈 APP 的安装，警惕向陌生人的转账以及不合理网络信贷办理等。第二，监管部门继续与银行等合作，遇到不合理网上银行转账要及时报警，有效挽回民众可能造成的损失，尽量实现整个监管过程的透明化与高效率。第三，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的提出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政策，对于一些诈骗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信息安全管理，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泄漏，保障用户可以更好的进行交易，法律的约束保障了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营。第四，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更好的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特性，让农村居民通过参与数字普惠金融获得更多参与感和满意度，增加居民的幸福指数，降低参与门槛和成本，让居民逐渐接受和适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和参与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从而可以更好的保持各个地方的数字普惠金融平稳发展，也能在发展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给予民众相应的优惠政策，使得资源可以优化配置，推动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

6.2.3 发展当地特色产业

近年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农村地区更多的新型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地区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地理区位优势等具有标志性的特点,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旅游、农家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数字普惠金融给予农户更便捷地消费信贷以及数字化的支付方式,有利于各个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走上快车道,各个地区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链,并且辐射周边城市。同时,随着电商平台的火热,基于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在农村地区悄然兴起,通过打造品牌模式等服务能力,带动了当地就业,让年轻人加入其中,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提升了更多农村居民更加消费方式与城市接轨,更好的利用了互联网的特性,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也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清楚的认识,节省了传统销售的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实现了双赢。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激活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新活力,为金融服务供给端和农村居民消费的需求端建起良好的桥梁,进一步带动了物流业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

因此,甘肃省各个城市要根据不同的特点以及地理因素增强特色产业发展建设,用发展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因地制宜地规划甘肃省各个不同城市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当地优势产业。

6.2.4 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技能

在现如今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的特点使得更多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享受到了支付和购买的便利,足不出户就完成想要达成的消费、理财或者保险等交易,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交易方式。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依托互联网、区块链等高科技技术,让更多农村居民可以更好的参与其中。尽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运用为很多农村居民带来了诸多好处,但是仍有很多农村居民对于这一较新的概念和领域存在知识欠缺和理解不够的问题。因此,在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地区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让更多人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触达性,了解产品的多元化。鼓励村镇干部起到表率作用,积极学习相关知识,增加金融知识储备,提升金融素

养，带动更多的农村居民加入其中。增加金融知识宣讲会，聘请专家走访基层，给农村居民带来深入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学习到更多的金融知识，更好的提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趣，并引导农村居民加入其中。同时，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运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课堂让更多学生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从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进行知识普及，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技能。

参考文献

- [1] Aditi Kapoor.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J]. Futures,2014,56.
- [2] Dexun WU,Xuemei ZHANG. Regression Analysi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Farmers' Consumption Structure[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2016,12(4).
- [3] Dilip Ambarkhane,Ardhendu Shekhar Singh,Bhama Venkataramani.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J]. Management and Labour Studies,2016,41(3).
- [4] Gupte R, Venkataramani B, Gupta D. 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37: 133-149.
- [5] Jennifer T. Lai,Isabel K. M. Yan,Xingjian Yi,Hao Zhan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2020,28(1).
- [6] Jie Li,Yu Wu,Jing Jian Xiao.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2020,86(C).
- [7] José Salazar-Cantú,Juvenicio Jaramillo-Garza,Bethzaira Álvarez-De la Rosa.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Mexican Municipalities[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5,3(12).
- [8] Junko Doi.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J]. 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6(3).
- [9] Klapper Leora,Singer Doroth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Digitizing Government-to-Person Payments[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7,32(2).
- [10] Laurence J. Kotlikoff,Avia Spivak,Lawrence H. Summers. The Adequacy of Saving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5).
- [11] MALCOLM R. FISHER. Exploration in savings behavior[J].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1956,18(3).
- [12] Mandira Sarma,Jesim Pai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1,23(5).

- [13] Pascaline Dupas,Jonathan Robinson. Why Don't the Poor Save More? Evidence from Health Savings Experime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4).
- [14] Peter Gomber,Jascha-Alexander Koch,Michael Siering. Digital Finance and FinTech: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2017,87(5).
- [15] Peterson K. Ozili.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J]. Borsa Istanbul Review,2017,18(4).
- [16] Sehrawat, Madhu,Giri, A.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verty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n countries[J]. Quality & Qua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ology,2016,50(2).
- [17] Sharmila S.. Digital Finance With Respect To Finan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2019,8(3).
- [18] Susanta Kumar SETHY. Developing a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2016,XXIII(2).
- [19] 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3).
- [20] Tullio Jappelli,Marco Pagano.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5).
- [21] Vicki Bogan.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8,43(1).
- [22] 戴序,董亚文.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9,No.223(02):29-36.
- [23] 丁建军,万航.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资产相对贫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06):59-65.
- [24] 杜蓉,乔均.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作用机制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2021(06):1-10.
- [25] 杜晓山.小额信贷的发展与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J].中国农村经济,2006(8):70-73+78.
- [26] 范方志,彭田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社会科学

- 战线,2023,No.331(01):82-91.
- [27] 耿良,张馨月.普惠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05):108-115.
- [28] 郭华,张洋,彭艳玲等.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0,No.308(12):66-80.
- [29] 韩晓宇.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减贫效应[D].天津财经大学,2017
- [30] 何婧,田雅群,刘甜等.互联网金融离农户有多远——欠发达地区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及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经济,2017(11):70-84.
- [31] 胡振华,金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21,51(16):67-76.
- [32] 黄秋萍,胡宗义,刘亦文.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贫困减缓效应[J].金融经济研究,2017,32(06):75-84.
- [33] 贾洪文,史子宇.区域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2021,No.301(04):88-102.
- [34] 蒋长流,江成涛.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5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03):75-84.
- [35] 蒋竹媛.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0,No.797(10):56-59.
- [36]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5(4):12-22.
- [37] 金露,曲秉春,李盛基.最低工资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J].税务与经济,2019,NO.223(02):44-49.
- [38] 黎翠梅周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J].经济地理,2021,41(12):177-186.
- [39] 李建伟.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No.366(10):14-23.
- [40] 刘锦怡,刘纯阳.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财经论丛,2020(01):43-53.
- [41] 芦国荣,薛晶晶.甘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调查[J].中国金融,2022, No.972(06):84-85.

- [42] 吕雁琴,赵斌.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金融与经济,2019, NO.508(12):76-81.
- [43] 罗楚亮.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4):51-57.
- [44] 罗振军,于丽红.数字普惠金融、多维贫困与金融减贫效应[J].统计与决策,2022,38(11):11-15.
- [45] 马卫刚,王兴启,马莹洁.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效应研究[J].工程管理科技前沿,2022,41(05):89-96.
- [46] 马亚明,周璐.基于双创视角的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02):3-20.
- [47] 裴辉儒,胡月.移动支付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01):37-44.
- [48] 彭自康.农村物流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2,No.854(19):115-119.
- [49] 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6):26-46.
- [50] 钱水土,章欣楠.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J].华北金融,2021,No.535(08):77-87
- [51] 尚昀,臧旭恒,宋明月.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1(2): 26-34.
- [52] 邵将,靳文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模式选择[J].农业经济,2021,No.407 (03):103-104.
- [53] 孙月梅.物流产业链发展对农村消费增长的影响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21,No.818(07):115-118.
- [54] 谭涛,张燕媛,唐若迪等.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分析:基于QUAIDS模型的两阶段一致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14,No.357(09):17-31+56.
- [55] 谭燕芝,彭千芮.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J].当代财经,2017,32(06):75-84.
- [56] 唐勇,吕太升,侯敬媛.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J].武汉金融,2021, No.259(07):18-26.

- [57] 涂颖清,万建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企业经济,2022,41(05):41-49.
- [58] 王极,洪名勇,田梦婕.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预防性储蓄视角[J/OL].农业现代化研究:1-12[2023-03-03].
- [59] 王琨媛,黄耀宇.互联网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3,No.863(04):107-110.
- [60] 王伟程.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框架初探金融理论与实践[J],2015(5):11 -15.
- [61] 王小华,温涛,朱炯.习惯形成、收入结构失衡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演化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6,No.668(10):39-49.
- [62] 王晓彦,胡德宝.移动支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支付方式的比较[J].消费经济,2017,33(05):77-82+97.
- [63] 吴本健,石雪,肖时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No.257(03):26-41+205.
- [64] 吴晓求.互联网金融成长的逻辑[J].财贸经济,2015(2):5 ~ 15.
- [65] 向玉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效应与门槛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22,No.841(06):172-176.
- [66] 杨军,张龙耀,马倩倩,黄馨谊.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江苏省 52 个县域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11):24 - 31+110.
- [67] 杨怡,陶文清,王亚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改革,2022,No.339(05):64-78.
- [68]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No.461(11):47-67.
- [69] 殷贺,江红莉,张财经等.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响应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检验[J].金融监管研究,2020,No.105(09):33-49.
- [70] 殷志高,任太增.移动互联网与农村居民消费: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微观证据[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11):27-37.
- [71] 张彤进,蔡宽宁.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经济问题,2021,No.505(09):31-39.
- [72] 张晓强,李心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依赖与路径设计[J].南京社会科

- 学,2017,No.360(10):19-23.
- [73] 张晓燕.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6,No.765(17):94-97.
- [74]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08):71-86.

后 记

行文至此，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最终化为“感恩、感谢、感动”。感恩，这三年来的学校和老师辛苦的付出，让我能够有能力的提升以及知识的积累。很有幸能够在此就读，这一份缘分，我会一直珍惜下来。感谢，读研的这段时光，让我不仅仅是收获了知识，还获得了眼界和思想的提升。感动，这三年同门和同学之间的友谊，让我在学习路上有并肩前行的同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更加光明的未来!